

胡佑章 著

用词法探索

YONG CI FA TANSUO



四川大学出版社

序

佑章与我的交往,前后大约已有十年左右的历史了。记得还是在上一世纪 90 年代初,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现代汉语骨干教师进修班”,学员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达数十人,远在四川的胡佑章也是其中之一。我为这个班和复旦中文系语言专业的研究生共同开设了《修辞学研究》课程,讲了一学期。这个班有几位同学对修辞学兴趣很浓,常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我讨论。我发现佑章思维敏捷,提问题较多,他的跨学科知识面广,分析问题有一定深度,当即觉得是个科研人才。讲习班结束后佑章经常来信,并不时将修辞学研究近作寄给我,有的我当即推荐给《修辞学习》杂志发表了。积以时日,逐渐就有了一批。同时还读到他在其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说明他很勤奋。后来发现他已发表的十多篇文章中,绝大部分与词语运用有关,表明他的研究很有计划。不久前他寄来积多年之劳写成的《用词法探索》书稿,嘱我写序。我望着这一厚叠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心血结晶,想到佑章在繁重的教学之余艰难的拼搏终于结出了硕果,真的有与作者同样高兴的心情。

披读书稿后,深感全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创新性。这些年来,我在总结我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越来越觉得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我国现代修辞学发展了近百年,前后经历了两次繁荣,研究的成果林林总总,但这些成果的重点,还是偏重于静态研究,也即偏重于对修辞手法的定义、结构、特征、作用方面的探索;着眼于动态研究——语言运用方面的成果较少。这一情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虽有了一定程度的扭

转^[1],但并未从根本上改观。从词语运用领域,即从动态探索的视角看,全面总结这方面规律,并且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的,还属凤毛麟角。而可贵的是佑章此书与已出的同类专著有较大的不同,无论是框架的构建、行文的展开,还是理论的参照、用例的搜集,都凝聚着作者独到的匠心,即都围绕着一个目的:探索用词规律,指导语言运用,显示了较强的动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以往研究的不足。不论此书开辟的创新之路是否完全正确(这一点还得留待历史去评论),至少从探索的勇气上看,作者所论是值得大大称道的。而且其中确有不少论述可说是另辟蹊径,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阐发、有所补充,其识见的新颖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讲的是该书总体上的创新。如从具体问题论述的角度审视,创新之处就更多了。以下仅以第六章论谐音为例。曾有人对某些滥用成语的谐音改造现象深为忧虑,认为会对初学者产生误导。作者觉得这种担心虽不属多虑,但不能说明为什么成功的谐音用法就不会产生误导,因为两者在形式上是完全相同的。他说:“语言运用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言语之海总是泥沙俱下、好坏并存的,谁也无法保证(虽然应该)为初学者提供一个纯净的语言环境,也无法把他们与社会语言生活隔离开来,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引导,以提高他们的语言素养,增强其免疫力。”因此,“滥用谐音现象应该受到批评,并不或并非主要在于它会对初学者产生误导,而是在于它的为谐音而谐音,在于它的画蛇添足、佛头着粪。”这段话颇为深刻地指出了掌握修辞知识的重要性。接着作者指出了成功的谐音应该满足三个条件:其一,谐音词必须成结构体;其二,谐音词必须与其他词具有某种语法联系;其三,谐音词必须具有较为明确的含义。这就比较具体地阐释了作者的有关新见解。

二、系统性。从全书结构看,可以窥出作者是力图将用词的各方面问题协调融通地组织进一个有机的整体之中的。全书共七

章。第一章属绪论性质,主要谈用词与立言造语的关系以及研究用词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第二章开始,采用由外到内和由内到外相结合的写法。第二章谈用词的物质基础,即用词的外部条件。第三章谈用词的心理动力,即言语主体究竟凭借什么样的内部力量将储存在大脑中的聚合元素弹射到横组合中去,这是由外到内。第四章谈用词的制约因素。第五章谈用词的策略,即如何适应与利用制约因素以及采用什么策略才能使言语达到预期目的,并获得最佳效果,这都是必须思谋运筹的,属内在的精神操作和情志活动。第六章谈用词的方法,即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将精神操作和情志活动的结果外化出来,这是由内到外。第七章谈用词的规范,即语言的社会性对用词活动的要求,这是用词的最后一道质检关口,也是本书的末章。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框架,把用词的一些主要问题统摄起来了。系统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作者在观察分析用词现象时,始终将其与相关现象联系起来,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如注意用词与前言后语、用词与左邻右舍、用词与内外部环境、用词与主客观条件等等的关联。这就避免了顾此失彼、偏执一端的弊病。

三、实用性。本书力求通过探讨和总结用词的策略和方法,以期对言语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其实用性表现在:一是十分注意取材和用例的典型性与广泛性。作者除从大量例证中挑选最恰当的材料加以充分阐释以外,例证本身还涉及到书面语和口语中的多个领域,涵盖了文学、科技、日常交谈等众多语体,使不同的交际对象都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二是除较多地从正面论证用词规律,即指出应该怎样做以外,有时还从反面总结误用、滥用的教训,指出为什么不应该那样做,使读者从正反对比中受到启发。

四、可读性。作者在《从语言学家的语言谈起》一文中曾说过:“语言科学女神固然不要求和文学、艺术女神一样浪漫、轻松、热烈,可为什么非得那般刻板、严若冰霜、寒气逼人呢?语言学论著

就不可以活泼一点、生动一点、隽永一点吗？……在语言学论著的操作中，注意行文的变化，注意积极修辞手段的利用，使‘板者活之，枯者腴之’，增加文章的情趣和韵味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大大有利于理性的砥砺与磨练的。”^[2]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力求做到这一点，除了写得平实、简洁之外，又注重情采与变化，让人读起来不但觉得枯燥乏味，不时还产生津津有味之感。

另外还有规范性。此书辟专章论述用词的规范；作者在写作时，也颇为注意规范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与此同时，本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似有以下几点：

第一，此书论用词的策略和方法都是选择性的，而选择就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比如用词究竟有多少种策略与方法？为什么只标举这些策略和方法而忽视另外的策略与方法？作者似未能做出有力的说明。

第二，修辞有两大分野，用词也有不同层次和境界。本书只谈积极修辞的用词策略与方法，对消极修辞的策略与方法几乎没有提及，这是颇为遗憾的。

此外，本书对某些用词现象，如校园流行语和网络语言中的用词现象等，均未纳入视野。这是疏忽，还是回避，抑或是知难而退？无论如何，这些用词现象是极富色彩的。

环顾全球，除西方修辞学界之外，西方文学界、美学界、哲学界、语言学界重视语言运用的大潮汹涌奔突，正在逐渐对我国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值此新世纪的画卷刚刚展开之际，佑章打出“词的生命在于运用”的大旗，率先捧出这部总结用词规律的专著，应该说是能够对这方面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的。正因为如此，我乐于为此书作序。

宗廷虎

2001年12月2日于复旦园

注释:

- [1] 参见宗廷虎, 汉语修辞学 20 年的回顾与 21 世纪前瞻, 见: 中国修辞学会编, 迈向 21 世纪的修辞学研究,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 [2] 胡佑章, 从语言学家的语言谈起, 修辞学习, 1993(4)

目 录

第一章 用词法研究论略	(1)
第一节 天光云锦赖织就	(1)
第二节 看似寻常最奇崛	(5)
第三节 为伊消得人憔悴	(8)
第二章 用词的物质基础	(12)
第一节 长袖善舞 多财善贾	(13)
第二节 了然于心始能如臂使指	(17)
第三节 河海不择细流	(40)
第三章 用词的心理机制	(56)
第一节 意念的导引	(57)
第二节 联想的粘接	(72)
第三节 情感的滋润	(81)
第四章 用词的制约因素	(88)
第一节 语 境	(90)
第二节 语 域	(109)
第三节 语 体	(120)
第五章 用词的策略	(128)
第一节 具象策略	(131)
第二节 变异策略	(139)
第三节 含蓄策略	(143)
第四节 简洁策略	(154)
第五节 幽默策略	(162)

第六章 用词的方法·····	(169)
第一节 谐音法·····	(170)
第二节 重叠法·····	(176)
第三节 转类法·····	(181)
第四节 异配法·····	(191)
第五节 易位法·····	(199)
第六节 臆解法·····	(205)
第七节 移植法·····	(212)
第七章 用词的规范·····	(219)
第一节 用词的误区·····	(221)
第二节 用词的规范·····	(227)
后 记·····	(240)

第一章 用词法研究论略

第一节 天光云锦赖织就

词是语言最基本的存在单位。它凝结意义,负载语音,其组合形式又体现语法。因此,语言的存在首先表现为词的存在。词又是语言最基本的使用单位。人们用语言来传情达意,总是以词与词的组合为条件得以实现的。可见,词作为语流中的一个个现成单位,作为语链中的一根根链条,直接关系到言语的生成,影响到言语的价值。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里用朴素的语言表述了用词对立言的重要作用:

夫人之立言,积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精英,字不妄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们进行写作,总是由个别的词组成句子,再由句子组成章节,然后由章节组成篇什。所以,要全篇光彩,必须每个章节都没有毛病;要各个章节都明丽,必须所有的句子没有缺点;而要所有的句子都优美,又必须一切语词都不乱用。这就从词、句、章、篇的相互联系中突出了词的基础地位与作用。作为立言行文的第一关,用词之得失、妍媸、工拙,必然对整个言语作品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一词之妙,通篇增色。由于词的个性不同,词在组合中的位置有异,有的词就成为注意的焦点,有如网目之纲,画龙之睛,使一句、一章甚至一篇生辉添彩。这种词,我国古代文论家常称之为“诗眼”“文眼”或“句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红杏枝

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被作者赞赏不已的这句词，见于宋祁的《玉楼春》，这里无妨抄录如下：

东城渐觉风光好，穀皱绿波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写景是一帧生机蓬勃、色泽鲜明的早春画，抒情则是一幅人生如梦、欢娱苦少、及时行乐、不惜千金买笑的颓废图。因此，如果要问这首词千百年来何以不废流传，那原因肯定不在颓废图的晕染，而在早春画的刻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闹”字的妙用：妙在以实状虚，以动写静，将触目皆春而又不可名状的春意用一动词“闹”来描画，则杏花满树、竞艳争芳的盎然春意就跃然纸上，如在眼前了。可以说，这一“闹”字如危崖高耸、孤标翘出，将全词的艺术水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虽有消极、颓唐之情绪流露，亦难掩其艺术光辉，而作者也因之遂有“红杏尚书”之美称了。

有时候，一句话或者一段话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由于其中有一个或几个词用得精当，于是整句或整段话就别具了一番趣味。这种例子在言语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

四月的天气。亚丽穿得很飘逸。那裙子的质不必借助风也飘荡，荡起了许多美学。（赵金禾《先生耐寒不耐热》）

这段话无非是描写裙子的质地轻柔，很美，着墨不多，但是因为“荡”起了“美学”，于是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学是一门科学；作为一个学科术语，“美学”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外延，其定义是庄严肃正的。用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概念来作“荡”的结果，从而说明裙子的质地轻柔，未免让人觉得有些不谐；而正是这种失调生成了幽默，令人不禁哑然失笑。另外，关于什么是美，是一个见仁见智、聚讼纷纭的问题，也是美学必须回答但又难以理清的问题；至于生活中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无需说得明白的，那么，“荡起了许多美

学”——就让美学去操心吧，美学不就是以美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吗？作者一本正经地跟美学开了一个玩笑，他那狡黠的目光也让我们忍俊不禁。

一词之瑕，众词黯然。由于同样的原因，有的词由于选择不当，也足以令全句甚至全篇受到牵累。刘勰《文心雕龙·指瑕》列举了不少用词失当的例子，其中提到了曹植：

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

在刘勰看来，曹植在众多文人中是较为杰出的了，但他在《武帝诔》中说“尊贵的英灵永远蛰伏”，在《冬至献袜颂》中又说“圣王的身體輕浮地飛翔”。說“輕浮”好像是蝴蝶，說“永蛰”則容易懷疑為昆蟲。這種詞用於描寫最尊貴的帝王，怎能恰當呢？劉勰的批評顯然是有道理的。詞都有一定的適用範圍，有一定的適用對象，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以此易彼，張冠李戴，自不免方枘圓凿，扞格難通。上面提到的“蛰”，指動物冬眠期間不食不動的潛伏現象，其適用對象自然是動物，用於描寫尊長，顯然系“斯言之玷”了。

在现代言语生活中，这种用词失察的现象也绝不少见。我们曾在某著名大学研究生宿舍区的开水房墙上看到过一则启事。大意是启事者不小心丢了一个小包，内有身份证、学生证、上机卡等重要证件，失者相当着急，请拾得者到某处联系。他特地申明：若有人告诉他，他将“不甚感激”——我们无从知道失者最终是否找回了他的东西，但愿他如愿以偿；如果不幸失而不得，那他的用词不当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拾金不昧，物归原主，本来不在乎是否受到感激；但你也不必特地申明“不怎么感激”呀！你“不怎么感激”是因为所失对你无关紧要，还是你对原物奉还这种行为本身不以为然？既然如此，那你就补办得了。显然，失者是将“不胜”误为“不甚”，可一词之别，义判天渊，其效果肯定也就大不相同了。

有时候,语言学家也偶尔出现这样的疏失。比如: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头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铿锵有力的话语通过扩音器,通过有线电波、无线电波,通过电视、报纸传遍全国,传遍全世界,神州为之欢呼,海外华人为之振奋,大家奔走相告,弹冠相庆。(王德春《论语言的调节功能》,《外国语》1991年3期;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5期)

“弹冠相庆”语见《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比喻因即将做官而互相庆贺。可见用“弹冠相庆”来描写华夏儿女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欢呼雀跃的喜庆之情是不够妥当的。

一词之异,工拙立判。在多数情况下,一词之得失,也许并不至于影响全局,但却能使语句在达意的适切程度、作者的态度倾向、问题的性质等方面判然有别。我国五代时期有位僧人叫齐己,善诗。他有一首《早梅》诗,前面四句是:

木万冻欲折,孤根暖独回。

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

诗人郑谷读了这首诗后指出:“数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齐己立即下拜。为什么“数枝”不若“一枝”佳?因为诗题既叫《早梅》,当指最先绽放的“一枝”,而非同时怒放的“数枝”。一词之易,使诗句更准确,更符合事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人们耳熟能详并能开口歌唱的。可这首歌原先并没有“新”字,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句话最早见于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标题,是针对国民党“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的说法提出的。因而当它被纳入歌词时,人们已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当了。据逢先知同志回忆:1950年,有一天毛泽东主席的女儿在院子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了立即给她纠正,说没有共

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此之后,毛主席还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到中央的会议上来。从此,这首流行全国的名歌中的这句话就改正过来了^[1]。毫无疑问,毛主席的一词之添,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为整首歌词增添了亮色。

从上面的叙述不难看出,我们所谓用词,并非一般地遣词造句,亦非消极地就意施词,更非一味地铺采摛藻、披锦列绣,而是一种积极的追寻,一种披沙拣金、千淘万滤的选择,一种呕心沥血、绞尽脑汁的创造:追寻言语表达的最佳效果,选择那最富表现力而又千钧不易的惟一符号,创造出新颖独特、魅力四射的组合形式。这种用词,就是修辞学中所谓的词语锤炼,也可以称之为艺术地用词或用词艺术。

如果把词汇比作丝线,把言语成品(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比作彩缎的话,那么,用词自然就是“晕碧裁红”的“点缀”功夫和“一回拈出一回新”的“金针”^[2]运作了。要想织出五彩斑斓的天光云锦,又怎能忽视一针一线的丝丝入扣呢?

第二节 看似寻常最奇崛

艺术地用词,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古人一般把词称为字,因此,词语选择或词语锤炼又叫炼字。一个“炼”字,既反映了古人对语言艺术的高度重视和不倦追求,也昭示了这是一条布满荆棘、充满艰辛的漫漫长途。我们在捧读前人那些珠圆玉润、流光溢彩的不朽篇章时,不是分明可以感受到他们那“语不惊人死不休”^[3]的执着、“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4]的辛苦、“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5]的悲壮吗?可见艺术地用词谈何容易!借用王安石的诗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6]。确实,艺术地用词的过程充满奇崛和艰辛,以至于我们要稍稍缕述一下它所必然要

涉及的问题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物质基础。艺术地用词既然是一种最优选择,那么对选择者来说,其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占有尽可能多的对象,亦即掌握丰富的词汇。据说,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人推行《基本英语》,谓只要记熟850个单词,便可用英语讲话了。但世间万事万物,纷繁复杂,用这点词够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怎么办?借别的词来代替。比如没有“泪”,就用“眼睛里出的水”来代替;没有“葱”,就说“让眼里出水的白色的根”;没有“胡须”,就必须说“长在脸上的毛”;刮、削、剃都用一个“拿”,请理发师刮胡须,要说成“拿去我脸上的毛”。结果笑话百出,左右碰壁。这个笑话说明:词汇贫乏,就必然左支右绌,前牵后扯;只有掌握了丰富的词汇,才有可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那么,怎样才能获取足够的词汇呢?怎样才算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心理机制。储存并掌握了足够的词汇,就一定能选择出最合适的词语吗?就一定能生成最佳的组合形式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用词是一种能动的选择过程,是一种复杂的智力活动,涉及主体的心理操作及变化。比如怎样激活记忆,怎样快速检索,怎样提取所需要的那一个符号,甚至怎样将不同的词语联系起来,怎样将词语纳入话语系统进行检测剔抉等等,这些问题人们至今还不能说找到了圆满的答案。

制约因素。用词是一种有目的的言语交际活动,更是一种为实现特定目的获得特殊效果而千淘万滤的选择行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用词都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绝对自由的,而是要受到诸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既包括语言的,如语音规则、语法规则、语法规则等,也包括非语言的,如语言运用的主客观环境、词语所处的一定的上下文语境等。怎样去适应这些因素,怎样去利用这些因素,怎样变被动为主动,如此等等,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策略手段。为了追求用词的最佳效果,为了主动适应诸种因

素的制约,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当然要考虑采用不同的用词策略和手段。因而探讨人们为实现特定的用词目标而使用的不同策略及手段,也是用词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方式方法。用词有没有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方式方法?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不过由于词语的选择是一种能动的意识活动,加之传统的炼字研究又更多是欣赏、感悟、笺注、点评式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以为用词之妙,存乎一心,只可以神而明之,不可以言而传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有它的构词法和造词法,也就不会没有用词法。因为语言既然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那么在纷繁丰富的言语实践中,就不可能不创生、筛选、积淀出大量的使用方法包括用词方法,尤其是像汉语这样历史悠久而又生命常青的语言,就更不例外了。因此,从浩瀚幽眇的言语之海中,分析、总结、概括出行之有效的用词方式和方法,用以指导人们的用词实践,正是用词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综上所述,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并且无时或已的用词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精神运作,一种积极的意识创化。它涉及多种因素,需要丰厚的积淀与投入。因此,用词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十分丰富。迄今为止,人们对用词现象的探索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用词现象做独立的、全景式的综合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扫描修辞学论著,用词大多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不痛不痒,可有可无。另外,人们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个案的收集、排比、批点、赏鉴上,缺乏宏观的抽象整合与理论建构。这样,解释力既有限,说明也难以深入,而琐屑、零散自然在所难免了。这些都是亟待改变的。

第三节 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营养,揭示用词的规律,建构用词的评价体系,从无比丰富的言语实践中总结用词的策略与方法,既是语言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言语主体言语实践的迫切需要。它无论是对促进词汇学、修辞学等的深入研究,还是对指导人们言语表达质量的提高,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值得“为伊消得人憔悴”。以下仅就用词法研究对词汇学研究的意义谈一点认识。

词的生命在于运用。词的意义消长衍变,乃至词汇系统的调整变化,都同词的使用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考察词义,追踪词义的发展轨迹;要研究词汇,把握词汇与社会发生共变的规律,都不能不密切关注词的运用。

词义是词的内容,它包括固定意义和临时意义两种。前者是词所固有的,是客观存在,可以在词典中查到,如概念义、功能(语法)义、色彩义、搭配义等;后者是词在运用中临时产生的,不可能在词典中查到,如社会文化意义、个人联想意义、语境意义等。词的固定意义当然不可能固定不变。比如“开发”一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的解释是:

以荒地、矿山、森林、水力等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劳动,以达到利用的目的;开拓。

同一词典的修订本(1996年)增加了一个义项:

发现或发掘人才、技术等供利用。

可见“开发”一词的词义范围扩大了。这是词的概念义的变化。又如动宾式合成词一般是不带宾语的,但是近年来,有相当数量的动宾式动词带上了宾语,如聚焦/登陆/造福/投诉等。此种用法来势甚猛,有增无减,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争论(邢公畹《一种似乎要

流行开来的可疑句式——动宾式动词 + 宾语》，《语文建设》1997年第4期；刘大为《关于动宾带宾现象的一些思考》，《语文建设》1998年第1,3期）。这或许可以看做是词的语法意义的变化。再如：“玩”的意义比较复杂。《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本）分为玩1和玩2：

玩¹①玩耍。②做某种文体活动。③使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等）。

玩²①用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轻视；戏弄。②观赏。③供观赏的东西。

但是在下面这些常见的“玩”中，上面的解释似乎都显得不太贴切：

～深沉 /～潇洒 /～飞机 /～电脑 /～股票 /～小说

这至少说明“玩”的搭配对象增多了。作家林斤澜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变化：

（王朔）忽然玩起电视剧来，打得山响的《渴望》有他的份儿。再以他为主，玩了个《编辑部的故事》，又是一番“轰动效应”。这个“玩”字，他自己说，别人也红口白牙地说。这是个老字，可是在五六十年代，没人敢张这个嘴^[7]。

词义的上述变化，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社会的变化、修辞的运用、语言内部的调整等。其中，修辞的运用是重要的推动力量。我们知道，修辞往往不按词的表面意义来使用，“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往往有相当的离异”^[8]。这样，用之既久，相沿成习，就凝固在词中了。这是词的语境义（临时意义）向词的固定义转化的重要途径。可以说，词通过借代、比喻、比拟等修辞方式引申出来的意义，都是这样获得的。例如：

〔墨水〕写字用的各种颜色的液体借代引申学问或读书识字的能力。

〔消化〕食物在人或动物体内，经过物理和化学作用而变为能够溶解于水并可以被机体吸收的养料。比喻引申理解、吸收所学